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三五）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〇一期 ——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5e）

【回首文革】	破“四旧”风潮的前前后后	何立波
【史海钩沉】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前前后后	刘炳峰
【法网恢恢】	老法官王文正回忆审判“四人帮”	王 岚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回首文革】

破“四旧”风潮的前前后后

• 何立波 •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极为荒唐的破“四旧”运动开始了。所谓的“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由于当时对于“新”和“旧”的概念没有科学的标准和正确的态度，加之红卫兵的盲目和无知，在江青、林彪一伙人别有用心煽动下，破“四旧”变成了砸文物、打人、抄家的同义词，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 伴随着“文革”风暴的出现，破“四旧”运动兴起

破“四旧”运动是随着“文革”的开始和红卫兵运动的出现才得以蔓延开来的。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信，称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支持”。此后，红卫兵运动迅速由北京向全国发展。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牛鬼蛇神”一词出自古诗，原意是指化妆游行中的一些角色，在“文革”中未

作清楚的定义就成了打击对象的总称。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但如何破“四旧”，中央没有说明。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煽动红卫兵说：“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正是由于毛泽东接见了红卫兵，并且亲自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使红卫兵由此声威大震，耀武扬威。“革命”小将以得到最高领袖的支持而得意不已。

从这天起，受毛泽东接见的30万北京红卫兵“小将们”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所谓的“破四旧”运动。在《造反歌》鼓舞下，一队腰扎皮带、头戴军帽的红卫兵少男少女，肆意横行在街头巷尾，他们的目光从店铺招牌转向包括历史文物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目标。

北京×中3000余名红卫兵，充当了破“四旧”运动的急先锋。8月19日清晨，他们冲上市内各主要街道路口，张贴他们的革命檄文《向旧世界宣战》，声称：“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这张大字报在北京主要街道广为张贴，后被刊载于1966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

红色的风暴席卷了北京的千家万户，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里就有十万多户被抄了家。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新闻舆论对于红卫兵的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间里播送了北京扫“四旧”的消息。8月23日，全国各大报均在头版头条登载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新华社电讯。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好得很》，社论指出：“我们为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在红卫兵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账拿出来展览……”于是，在全国大抄家之余，又有了个“大展览”。一首《赞红卫兵》的小诗写道：“红卫兵，军容壮，/毛泽东思想来武装，/革命战歌震四方，/牛鬼蛇神无处藏。/红卫兵，决心强，/灭资兴无当闯将，/彻底摧毁旧世界，/共产主义放光芒。”

北京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广阔农村。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有11万4千多户被抄家，粗略统计，仅抄走古旧图书达235万多册，瓷器、字画、古典家具三项近400万件。仅西城区一个福绥境街道，就有1061户居民被抄家，抄走的图书字画被焚烧了整整八天八夜。按周恩来总理的说法，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十年浩劫给我国文化事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主要就是源于“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运动。

为了减少损失，周恩来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党的《十六条》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是在周恩来的坚持下才写进去的。但是似乎并未发生多大作用，于是周恩来又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组织红卫兵纠察队，让红卫兵纠察队来维持社会秩序，约束红卫兵的违法行为。红卫兵纠察队确实对停止八九月份打人、抄家狂潮起到了一定作用。当然红卫兵纠察队也是良莠不齐，他们中间一些人仍然打人。

◇ 文物古迹，图书字画，成为破“四旧”的重点打击对象

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均成为“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竟有4922处被毁，其中大部分毁于1966年的八九月间。

在北京的破“四旧”运动中，就连中共中央、毛泽东办公地的新华门前的石狮子，也引起了红卫兵的注意，列入“破”的名单。新华门前的石狮子，是北京城里最大的一对石狮子。8月26日，周恩来从保护文物古迹出发，耐心地说服了红卫兵，下令将新华门前的石狮子搬走，有效地将这一古迹保护起来。后来这对石狮子又回到了它原来的地方。

而颐和园的命运就没有新华门前的石狮子那样幸运了。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看到残缺不全的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心。而今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战火中幸存下来而红卫兵又够得着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颐和园中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几乎每一个雕梁画栋都有精细的彩画，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虫鸟。人物画都有典故出处，例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这四个人皆属于反动派，必须消灭。红卫兵在颐和园内仔细搜索，凡是画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

上海也是破“四旧”运动的重灾区之一，众多文物古迹也难逃厄运。始建于三国东吴时代的龙华古寺惨遭浩劫。被誉为“龙华三宝”之一的范金毗卢佛像高约7尺，莲花座下配有千佛，乃是无价之宝，在红卫兵“小将”们一阵棍棒下即成碎片。弥勒殿供奉的弥勒化身布袋和尚坐像竟被砍下了头颅。在相传建于三国东吴时期的静安寺中，红卫兵们捣毁了珍贵的真言宗密坛，仅余下了几间寺屋的静安寺，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

就连偏远的新疆，文物古迹也受到冲击。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这些壁画流失到国外，成为中国的重大损失。但它们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红卫兵却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者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使这些珍贵的壁画成为废物。著名作家阿英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

古旧图书和字画，在破“四旧”过程中也遭到了灭顶之灾。“砸烂旧世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响彻全国，一时间人人自危。一些家里藏有珍贵图书、字画、瓷器等老古董的居民，终日诚惶诚恐，时刻怕红卫兵抄家游斗带来灭顶之灾，许多人在深更半夜偷偷自焚古旧图书、字画等珍贵传统艺术品。在那场彻底“砸烂旧市委”的“战斗”中，北京市委、市政府不得不把收藏的许多名家字画，明清瓷器，也扫进“四旧”的垃圾堆。

在红卫兵抄家的过程中，居民家中珍藏的古旧图书和字画，也遭到清洗。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太儒’”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就遭到红卫兵抄家的厄运。他后来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

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

惠孝同是中国画院著名画家，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居所，就收藏有他作的画。但此时国画家几乎全部是“牛鬼蛇神”，惠孝同也不例外。红卫兵抄他的家时发现一只木雕小象，全身通黑、惟象牙是用真象牙雕刻的。那是作家老舍访问印度时印度友人的赠品，老舍转赠给惠孝同的。“看你们这些反动文人还张牙舞爪的！”抄家者举起小象就朝地上砸，将象牙砸得粉碎。他们将画室砸得一塌糊涂，勒令惠孝同自书一幅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贴于门窗，才扬长而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著名“红学专家”俞平伯，也难逃红卫兵的魔掌。红卫兵挨个审问文学所的“牛鬼蛇神”。轮到俞平伯时，红卫兵厉声喝问：“叫什么名字？”

俞平伯有点结巴：“叫，叫俞平伯。”“写过什么毒草？”“我，我写过《红楼梦研究》。”因为结巴，“研究”两字，红卫兵小将们没听清。“啊！原来《红楼梦》就是你写的？”红卫兵大喜，感到有了重大发现。总算找到罪魁祸首了。“不不不，不敢掠人之美！《红楼梦》不是我写的！”俞平伯更结巴了。“刚才还说是你写的，转眼就不认账，真不是玩意儿！”红卫兵套用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台词，还往俞平伯头上打了一巴掌。

在“文革”中，红卫兵破四旧，把原有的街道、胡同名称都改成诸如“东方红街”、“反修胡同”等“革命性”的名称。而“不识时势”的俞平伯，却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本考证北京街道胡同的书。此事被红卫兵知道后，其后果可想而知，俞平伯又被狠狠地批斗。红卫兵说：我们破四旧，你倒在复四旧，可见你复辟之心不死！

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大肆掠夺。这无疑是对破“四旧”运动最大的讽刺。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本159本，唱片1083张。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本4本。黄永胜拿走文物342件，图书5702册，唱片180张，笔88支，纸49卷。吴法宪拿走文物151件，图书620册，笔57支，唱片162张。李作鹏拿走文物579件，图书1494册，笔87支，唱片191张。邱会作拿走文物188件，图书1161册，唱片599张。

在林彪集团和陈伯达这一伙人中，除陈伯达是文人外，其他都是军人。论文化水平，除林彪、陈伯达高一些外，黄、吴、李、邱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他们却都一致对文物古书发生了兴趣。他们的一致，并不是一致要批判文物这些所谓的“四旧”，更不是都懂得鉴赏（只有陈伯达算个内行），而是一致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宝物，很值钱，所以值得收藏。

康生和江青也是“四旧”的收藏者。1970年秋，江青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十八开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7元钱。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私有，他得到一册《大唐三藏圣教序》后，竟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从三千年前的青铜器到两千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

画家叶浅予在“文革”结束后被获平反，文化部决定将当初抄家物资归还给他。但不少珍贵字画、墨、砚、石章，早被当时的“中央首长”拿走，文管会只给他开了一张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九件）、林彪（十一件）、康生夫妇（八件）、江青（三件）、XXX（一件，因为他不属于林、江反革命集团，这里姑且略去其名字）、李作鹏（一件）。

◇ 保卫文物古迹的斗争

文物图书的严重破坏，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67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发〔六七〕158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中央提出七条意见，第五条写道：“各地革命委员会或军管会应该结合对查抄物资的清理，尽快组织力量成立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对破四旧过程中查抄的文物（如铜器、陶瓷、玉器、书画、碑帖、工艺品等）和书籍、文献、资料进行清理，流失、分散的要收集起来，集中保存，要改善保管条件，勿使损坏。一时处理不完的，可先行封存，逐步进行处理。”第六条写道：“各炼铜厂、造纸厂、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对于收到的文物图书一律不要销毁，应当经过当地文化部门派人鉴定、拣选后，再行处理。”这条措施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对文物图书的破坏。

在破“四旧”的过程中，为了保护珍贵的历史文物和古迹，有正义感的文物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和群众想出不少妙计。湖北黄梅县内著名的五祖寺的文管部门和僧人就很聪明，略施小计，使古寺得以保存。在该县其他寺庙、道观全被砸烂之际，黄梅县历史博物馆和文物保管会为保护五祖寺，用盖有“黄梅县文物保管会”印章的封条将各殿封住：“正法眼藏”匾用写有“破除迷信”的纸盖住；梁柱上的“阿弥陀佛”覆盖上“革命到底”。墙上的花窗、雕砖均糊上白纸，写上革命标语。在附近农村生产大队的协助下，庙里的住持法师将寺院几十箱重要文物用拖拉机运走，无法搬运的玻璃柜中的弘忍禅师（即五祖）的真身佛像则用画覆盖，两旁的玻璃则配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紧跟毛主席永远革命”。寺门紧闭，僧人们打扮成红卫兵模样，又在墙头打出工厂和学校红卫兵的旗帜，吓退了前去“破四旧”的红卫兵，方将这已有1300年历史的佛教禅宗的发源地完好地保护下来。

上海三大名刹中只有玉佛寺幸免遇难，得以保存的原因和五祖寺大同小异。玉佛寺的两尊巨大的玉佛，一坐一卧，都是无价国宝。为免遭砸毁，寺院僧人及工作人员将玉佛用红纸封住，再将毛主席像片贴满佛身。这样，玉佛就因为革命小将不敢碰毛主席像而得幸存。该寺所藏的唐代以降的经书也预先转移至仓库而被保存。而位于玉佛寺边的佛教书局却被捣毁，大量佛经、法物、佛像被红卫兵扔到大街上焚烧，致使江宁路的柏油路面被溶化，檀香木发出的香气十里可闻。

而陕西扶风的法门寺得以保存，可歌可泣，凝聚了一位高僧的生命。“文革”后挖掘出土的法门寺地宫的佛指舍利，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有文献记载和碑文证实的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同时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惟一的佛指舍利，是佛教最高圣物也是国宝。而这个稀世之宝，险些毁于红卫兵的手下。

1966年盛夏一个阴霾的日子，几辆解放牌大卡车载着一批臂戴“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来到了法门寺，砸佛像，烧佛经，法门寺被搞得狼籍一片。破完了地面的“四旧”，红卫兵小将们似乎也从典籍中看到或者听老人们讲到，法门寺塔下有地宫，地宫中藏有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不知是处于一种年幼好奇，还是一种“头可断，血可流，誓死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精神”，他们又扛来了镢头、铁锹，要把法门寺挖个底朝天。

此时，身为法门寺住持的良卿法师，面对这一切显出平静与宽容的神态，他双目紧闭，只是默默地诵着佛经，但愿佛祖保佑，使法门寺能够躲过这一场劫难。良卿法师不紧不慢地拨动着手中的佛珠，红卫兵小将挥汗如雨地挥舞着手中的镢头，振臂高呼“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来者不善，小将们气势汹汹，古刹就要毁于一旦。良卿法师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慢慢地从蒲团上站起来，穿上他那红底镶金的袈裟，凝望着直刺苍穹的巍巍宝塔。然后，他把身旁所有

的被褥、草垫、柴禾堆放在一起，浇上煤油，自己又不慌不忙地坐在其中，用他那饱经风霜的手划着了火柴，点燃了自己。红卫兵小将突然发现了火情，他们跑去一看，个个吓得目瞪口呆。烈火中，只见良卿法师双手合十，巍然端坐。他身披的绛红色袈裟在燃烧着，火舌无情地舔着他衰老的躯体，但火中的良卿法师不挣扎，也无痛苦，合掌安坐，平静地让自己化为灰烬。

在熊熊燃烧的烈火面前，红卫兵小将们纷纷扛着镢头铁锨溜之大吉。法门寺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法门寺地宫终于免遭了一次劫难。此后，法门寺成了“扶风地区无产阶级造反派临时总指挥部”，并沦为武斗的战场。惟一值得庆幸的是红卫兵不再挖掘塔基了，留有红卫兵挖掘时留下的糖纸、花生皮的深坑已被人悄悄填平。

2002年2月23日，法门寺的佛指舍利在24名武僧的保护下，抵达台湾。这24名武僧来自中国佛学院与闽南佛学院，他们都签下誓言，决心在非常时刻以生命护卫舍利。台湾方面做好了相关的安全防护措施，不仅派出护法金刚团，还采用防弹玻璃、安全检测器等设施。中新社的报道说，佛指舍利自在法门寺地宫中发现以来，这是第二次出境，第一次是在1996年被迎迓至泰国供奉，但这次赴台的仪式远较第一次隆重，除了数百迎迓、恭送的人士外，大陆方面更出动大批武警、交警担任护卫安全、维持秩序的工作。

对法门寺佛指舍利的保护如此兴师动众，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它是稀世珍宝，具有不可再生性。1987年考古部门挖掘地宫的现场发现的红卫兵挖掘时留下的糖纸、花生皮，距离地宫相距不到一尺。如果红卫兵再多挖一尺，地宫就肯定在劫难逃，那么今天就看不到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和数千件价值连城的文物。

与中国西北高僧保卫古刹的斗争遥相呼应的，是浙江大学学子和杭州市民保卫在东南亚享有声誉的古刹灵隐寺的斗争。而这场斗争，似乎更值得大书一笔。杭州的中学生红卫兵气焰嚣张，在北京红卫兵掀起破“四旧”战役后，他们也不甘示弱，蠢蠢欲动。8月23日，红卫兵雄赳赳气昂昂，全副“武装”走上街头，向所谓“封、资、修”的所有目标开战。西泠桥旁的苏小小墓被扒平，乾隆皇帝御笔手书的“西湖十景”石碑被砸烂。杭州大学的个别红卫兵不甘落后，企图一鸣惊人，他们把矛头直指“岳王庙”。一张历数岳飞镇压农民起义等数条罪行的“声讨檄文”，张贴在岳王庙的朱色围墙上，在一片呐喊声中红卫兵开始扫荡整个岳庙。出自历代名家之手的抱柱楹联和匾额纷纷被摘下砸烂或劈为薪柴。连“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等匾额和“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等楹联也未能幸免于难。由于这些红卫兵手头没有过硬的作业工具，他们对岳王庙里的石碑、石人、石马等无法下手，最终让这些珍贵文物逃过一劫。

岳王庙被砸，当时在杭城引起不小的震动。岳飞的功绩彪炳千古，他的英雄形象早已经根植于天下百姓的心中。鉴于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杭州市民虽然愤愤不平，但都敢怒不敢言。杭州中学生红卫兵在捣毁岳庙之后，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灵隐寺。

浙江大学部分有正义感的学生得知消息后，纷纷挺身而出，保护灵隐寺。经浙大广播站广播后，大批学生前往灵隐寺，表示声援。而红卫兵也誓死捣毁灵隐寺，他们的“大部队”也开进灵隐寺周围。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灵隐寺周边村庄的百姓，自发组织一批青壮年，加上灵隐寺园林管理处的部分职工，前来支援守护灵隐寺的浙大学生。他们熟悉当地地形，对灵隐寺山前山后的所有通道入口处都派人守候，防止有人夜晚偷袭。他们对守护大殿的浙大学生们说，你们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全力支持你们。

浙江省委迅速把此事上报了国务院，并要求在接到国务院答复之前，对立双方都必须保持克制，停止一切过激的行动。为取得杭州市民的支持，浙大学子向市民散发了保护灵隐寺历史文物古迹的“告全市人民书”，在全市引起很大震动。杭州街头贴满了大字报，群众纷纷起来谴

责红卫兵鲁莽、无知的行为，表示坚决支持浙大革命师生保护灵隐寺的行动。群众纷纷管教自己的子女，要他们立即收手，千万不要做出伤天害理的蠢事。

8月27日，周恩来作出批示，要求浙江省委领导对红卫兵做好说服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灵隐寺。当晚，杭州市长王子达到灵隐寺，向浙大学子和中学生红卫兵传达了总理办公室电话指示记录。当听到周总理希望保留灵隐寺的指示时，浙大学子欢呼起来。其实，这位爱护杭城文物的市长冒着风险有意漏掉了电话记录的最后一条：“要爱护革命小将们的革命积极性，要是大家一致同意砸掉菩萨佛像，那就砸掉算了。”

8月28日，周总理的指示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整个杭城，社会上的舆论更加倒向保护灵隐寺的浙大学子一边，中学生红卫兵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迫于来自各方的压力，中学生红卫兵决定全部撤出灵隐寺。随着杭州红卫兵南征北战大串连的开始，他们在杭州破“四旧”的行动逐渐偃旗息鼓。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杭州市政府对外发布公告，宣布灵隐寺以及整个灵隐景区包括飞来峰造像等从即日起全部封闭，停止对外开放。杭州市园林管理局组织建筑施工队伍进入灵隐寺，夜以继日地施工，迅速地用砖头、石灰把灵隐寺内的所有大殿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如今的“灵隐寺历史大事年表”，清楚地记载了这一事件的简单经过。破“四旧”运动中，全国古刹旧庙被砸、被毁不计其数，能够部分保存下来的算是侥幸。但是像灵隐寺那样，毫发未损、完整地保护下来的，却是凤毛麟角。

◇ 掘墓狂潮

谭厚兰曾是“文革”期间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当年红极一时。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今天的曲阜师范大学）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戚本禹又请示了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于是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

著名古文献专家周予同教授专治经学，因为尊孔而被从他工作的上海复旦大学千里迢迢解押到山东曲阜，被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当孔子的塑像被拉着游街时，周予同、高赞非等参加过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被拖在后面，为孔子“送葬”。回上海不久，这位古稀之年的学者病倒了，瘫痪卧床，双目失明，整整13年，直到1981年去世。

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对于这个“致敬电”，毛泽东未予置词。

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如今孔庙奎文阁前和现在十三碑亭中，不少石碑有明显断纹，就是当年被谭厚兰率领红卫兵砸碎砸断，后来才接上的。而石碑接上后，却永远留下了缺憾。

值得庆幸的是，曲阜的乡亲们为了挽救文物，他们把孔府、孔庙里档案、文书，以及元、

明、清代的服装、出土文物、稀世碑碣等等抢救出来，藏匿在各处。孔府前的那对大石狮子四面围上木板，外面贴上“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们不敢承担撕毁毛泽东语录的罪责，大石狮子因此未被砸坏。

由于戚本禹称赞掘孔子坟的谭厚兰他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此后迅速刮遍神州大地。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有记载的古人，差不多都在1966年遭到厄运。

西楚霸王项羽的霸王庙，项羽的爱妾虞姬的虞姬庙和虞姬墓，延续两千余年，却在1966年的破“四旧”运动中，成为了“反动派”，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西汉大将霍去病为保卫汉室立下了汗马功劳，但霍陵也在此时被毁。香烛、签筒被打烂，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在东汉名医张仲景的老家河南南阳，有个建于明代的“医圣祠”。在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中，“医圣祠”的房屋被破坏，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河南南阳的“诸葛草庐”，也难逃厄运，“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被全部捣毁，殿宇饰物被砸掉。东晋书法家、被誉为“书圣”的王羲之，晚年称病弃官后却长住今浙江嵊县金庭乡。红卫兵认为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也属于“横扫”的行列，于是将王羲之墓及占地二十亩的王羲之故居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只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在拉萨，著名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也因为松赞干布是大农奴主而文成公主是大地主头子的女儿，于是遭到被砸的厄运。在河南汤阴，年轻的红卫兵以岳飞为耻。他们开拔到岳庙，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一同“消灭”。明太祖朱元璋在老家安徽凤阳建有皇城，红卫兵嫌手工砸太费事，于是调来炸药将其炸毁。明代清官海瑞在“文革”前已受到批判，破“四旧”开始后，红卫兵千里迢迢赶到海南岛，砸掉海瑞的坟，挖出他的遗骨游街示众。

就连牺牲于蒋介石屠刀下的爱国将军杨虎城，仍被红卫兵视为“国民党反动派”，杨虎城将军墓及墓碑都砸毁。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也毁于一旦。8月28日，广州市近千名红卫兵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地汇集，举行了宣判“散发着资本主义毒素”的“自由神”大会。大会后，红卫兵登上墓顶，手持铁锤将“自由神”捣毁。

在南京，新街口广场的孙中山铜像，因为孙中山属于国民党，也逃不过红卫兵的“火眼金睛”。红卫兵在铜像上张贴“勒令”，限南京市委于二十四小时内拆除。南京市委向国务院请示后，连夜拆除铜像，迁移到市郊中山陵保存。

对于宋庆龄，中共中央是保护的，但她父母是“资本家”，他们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被红卫兵砸烂，墓碑被推倒，墓中的骸骨被挖掘出来，实行“暴尸”。因为万国公墓过去安葬的大多是中外富裕人士，所以红卫兵把它看成是昔日特权阶层的纪念碑，必须予以摧毁。至于宋家的墓地，这里埋葬的不正是蒋介石的岳父母“查理”和“妈咪”吗？在他们看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应该从这个地球上消灭掉的呢？在宋庆龄请廖仲凯的女儿廖梦醒把宋家墓地被毁的情况告诉邓颖超后，周恩来指示重修，上海有关方面不得不遵命重修宋氏墓园，但上海市革委会耍了个小动作，新立墓碑时没有按照原来的墓碑重刻。原来的碑上刻有立碑的宋氏子女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名字，而新墓碑上除宋庆龄外全部被“革了命”。“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重新换了墓碑，完全复原。这件事情给宋庆龄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 “时髦”的改名浪潮

为了显示“革命”，破“四旧”开始后，红卫兵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改名浪潮。

改名运动早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就已经开始了。这天，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把一枚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了左胳膊上。宋彬彬几天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她给毛主席戴红袖章的经过。

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彬彬突然想到应该让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的红卫兵。有了那个让她怦然心动的想法后，她找到了主持大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想献给毛主席一个红袖章。在过去的集会上，经常有给毛主席戴红领巾的事情，所以工作人员也就很痛快地把她带到毛主席身边。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宋彬彬回答后，毛泽东说：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

此后，一些人纷纷效仿，把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云”、“春、夏、秋、冬”的，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理、智、信”等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例如“红旗”、“文革”、“红岩”、“卫东”、“向东”、“继红”、“永革”、“东风”等等。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上海某工厂有个人，早先是资本家，名字叫“养民”。红卫兵说他的名字意思是说资本家养活了人民，反动透顶。全厂日批夜斗他，并勒令他将名字改成了“民养”。有位中学教师名“念修”，那不是“想念修正主义”吗？全校大会批斗后，学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东”。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都掀起了改名风潮。在北京，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全被红卫兵涂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同仁医院被改成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改成了反帝医院，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长安街被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北京崇文织布厂改为“北京东方红兴无织布厂”，清华附中也改为“红卫兵战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则改为“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著名的老字号、卖国画的“荣宝斋”，被改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等等。

在破“四旧”运动中，位于前门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也受到红卫兵的“革命”。8月19日晚，上千名红卫兵闯进了全聚德烤鸭店，将挂在店门口已经七十多年的“全聚德”的招牌砸烂，换上了由红卫兵事先写好的“北京烤鸭店”的牌子。红卫兵把原来挂在店铺里的山水字画全部撕毁，换上了毛主席画像，又推举出10名红卫兵当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长驻店铺。8月20日一大早，经过红卫兵小将“革命”的新型烤鸭店诞生了。前门贴着一张醒目的标语：“欢迎工农兵进餐”。

8月24日，北京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组织了数十万人参加的“反修路”命名大会。“反修路”原为“扬威路”，是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的一条马路。狂热的造反者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吼声中，一致赞成把“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把北京市第二女子中学，易名为“反修路中学”。

几天功夫，北京市大街小巷，南城北城，工厂农村，面目全非。到处是花花绿绿的大字报、大标语、倡议书，到处是红旗、红袖章、红喜报、红毛选，《革命造反歌》、《红卫兵战歌》、《毛主席语录歌》成天放个不停，大街上无论男人女人一律是军服、解放鞋。

面对这热火朝天的“造反”运动，北京市的居民纷纷把四合院大门上的“福”字和一些表现吉祥如意人丁兴旺的对联刮掉、砍掉，或者用时兴的对联遮盖住。拥有私产房的市民纷纷跑到房管局申请上交房产，当时房管局里每天都排着长队。

改名浪潮也迅速波及到全国其它城市。造反的学生和工人称之为：“横扫千军如卷席。”

改名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云南一个古城叫宣威，有人说这“宣威”的古意是“宣大汉之威”，得改。于是革委会通过决议，宣威县就改成了永丰县，意思是永远丰收。仅就立意而论，这也还不算太坏。但问题却来了，因为宣威县改名了，宣威的特产——著名的“宣威火腿”就不得不跟着改成“永丰火腿”。接着有外国客商在广交会上订购十万条名扬海外的“宣威火腿”，谁知货送达后，订货的外商拒收，因为他坚持要“宣威火腿”而不是“永丰火腿”。改动一个著名商品的名称，就要蒙受巨大经济损失。革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可否“复古”事宜。“复古派”说，必须立即恢复宣威地名，否则火腿卖不出去，赚不到外汇是无产阶级的巨大损失。反对“复古”的则坚持“封资修”的名称必须坚决取缔，这是原则问题。僵持中，幸亏有个聪明人站出来说：“宣威宣威，也可以是宣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威嘛”。一个“原则性”的危机，居然就被这个文字游戏化解了。

破“四旧”运动带来的全国性地名、路名大改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造成信件难以投递，电报无法送达。不仅外来人员找地方难，即使是当地人也常常被搞得晕头转向。后来，改过的地名和路名不得不又恢复原来的名称。但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造成了严重的混乱。

◇ 风俗习惯大“改革”

破“四旧”中有破除旧风俗和旧习惯两项，占了“半壁河山”，因此红卫兵对于这项事业投入了很高的热情。

但什么是“旧风俗”和“旧习惯”，中央没有明确标准。破“四旧”运动的急先锋北京×中的红卫兵小将们，在《向旧世界宣战》的檄文中列举了一些：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在列。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老爷们盘踞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以及黄色照片书刊，正在受到严厉的谴责。我们不要小看这些问题，资产阶级复辟的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为了“革故鼎新”，北京×中的红卫兵小将们向理发、缝纫、照相等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我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刊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成短裤，余下部分可以做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作废品处理……我们要管，还要管到底。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对此举予以声援，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

红卫兵小将们走上街头，把街上的行人从头到脚检查一下。女的长波浪发式，男的大包头，必须立刻去附近理发店剪掉。不然的话，红卫兵会用剪刀当场帮你剪掉。红卫兵不是理发师，没有理发技术，虽然不收钱，但如让他们剪的话，一定剪成个更怪的发式。所以凡是被抓到的人，都乖乖地自己走进附近的理发店去。其次是小裤腿管。虽说当时发布票，做小裤腿管可以节约用布，但据说是外国阿飞穿的。中国人能去学外国的阿飞吗？所以红卫兵小将们当场采取“革命行动”，把裤腿剪开，一直剪到膝盖部份。再次是尖头皮鞋。碰到红卫兵时态度要好，马上脱下尖头皮鞋，拿在手上，声称回家后马上处理掉。有时红卫兵还在皮鞋上剪一刀，免得这些人拿回家去藏起来过了风头再穿。

在上海，革命小将限令西餐店停业，服装、皮鞋店停止出售“奇装异服”，凡发现行人中穿尖头皮鞋者就责令脱下，赤脚走路；穿着、发型显得“时髦”的就被剪去一刀。与此同时，上海街头的许多西洋雕塑被砸毁，教堂被冲击。

“文革”爆发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在回忆录里记载了在天津见到的“破四旧”的场面：“我们遇到了红卫兵设的路卡，正在检查过往行人的着装。……只见那些红卫兵的手里拿着剪子、榔头等工具，对那些着装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着非常‘革命’的行动：有的长辫子被剪没了，有的‘怪发形’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锯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尽管这些人在和红卫兵讲理、央求，反抗，可是在‘这是革命行动’一词的压力下，无一幸免。”

就连住在中南海内的朱德，也感受到了破“四旧”的气氛。8月下旬的一天，朱德从外面回到家里，发现他心爱的几盆兰花被孙子作为“四旧”砸了，气得举起拐杖打去：“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但这时全国上下都在破“四旧”，他没办法保住他的兰花，便将剩下的兰花悉数送给了北京花木公司。

破“四旧”一开始便有人主张禁烟，不是禁大烟，而是香烟。大字报已经贴出：“抽烟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百害而无一益，自即日起，一律禁止抽烟，否则将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红卫兵小将说到做到，勿谓言之不予也！”但是抽烟的人对红卫兵则另有一番道理，在大字报上批道：“毛主席还抽烟呢，你看见没？伟人都抽烟，鲁迅、斯大林……”红卫兵们的告示又改成禁止35岁以下的人抽烟。

红卫兵甚至企图改变和尚不结婚的习俗。1966年8月下旬，北京红卫兵来到福州东郊著名古刹涌泉寺造反。一个红卫兵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能造一造佛门规矩的反，给老和尚找个老伴？于是批斗和尚的大会结束后，他问一个老和尚，你愿意娶妻吗？老和尚连忙摆手说，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不同意也不行，红卫兵找来一个寡妇，把她与老和尚一起反锁在了一间屋子里。红卫兵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了。次日清晨，红卫兵也顾不上吃早饭了，直接来到老和尚与寡妇这里，打开了房门。红卫兵惊呆了：老和尚盘腿打坐，寡妇则战战兢兢地躺在床上。

破“四旧”开始后，一些在领导干部和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作服务工作的人，也认为保姆服务属于“四旧”，应该破，于是采取了“罢工”措施。在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茅盾的家里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服务员老白认为，保姆带孩子，服务员照料首长生活，都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是为老爷服务，所以他也要“造反”，每天迟到早退，晃一晃就走。

茅盾夫人孔德祉吩咐老白掸一掸客厅里油画上的灰尘，他不干，说这是“四旧”，他们争吵了起来。十分恼火的老白于是叫来了“人大三红”的红卫兵。1966年8月30日清早，一群红卫兵闯进家来，领头的小伙子举着一把日本军刀，声称他们得到举报，说这里有大批“四旧”物品，他们是来清查这些物品的。他又对茅盾说：“我们对你还是客气的，白天来。张治中家我们是夜间去抄的，刚刚抄完，我们是直接从他家里来的。”他举起明晃晃的军刀得意扬扬地说：“这就是从他家里抄来的战利品。”茅盾很生气，马上给统战部打电话，结果答复是这些统战部接到不少红卫兵抄家的告急电话，可是统战部也无可奈何，根据大家的经验，最好的办法是以礼相待，表示欢迎。

随着破“四旧”运动的深入，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有的红卫兵小将们提出，要求改变我国的现有交通规则，要变右侧通行为左侧通行，他们说右侧通行，不是革命规则，是右派分子们的规则。在中国这样的革命国家，应该是左派处处通行。同时，他们还提出交通路口的指示灯也有路线问题，因为，交通规则说明，红灯停绿灯行这也不符合左派的要求，红色代表革命，

黄色代表资产阶级，怎么能红色一出现就停止了昵，怎么处处与红色作对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红灯行、黄灯停才对！有形的“四旧”容易破，无形的“四旧”破起来就相对困难些了。不准烧纸、上坟，不准拜年、磕头，若干年的习俗要一下子改变非常别扭，但是也没有人能绕过那个别扭的年代。

破“四旧”运动是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肆虐神州的。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此后到1978年，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衰落，破“四旧”运动逐渐烟消云散。“破四旧”运动对传统文化和民俗是一次大规模的扫荡。这种不分良莠的清扫无疑是一场破坏，使得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遭到毁坏。但是，民俗和文化都具有超常的稳定性，特别是那些属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特质，早已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深处，难以根除。

□ 党史文苑 2006年第3期

~~~~~

### 【史海钩沉】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前前后后

• 刘炳峰 •

所谓“三支两军”，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奉毛泽东、中央军委之命，支持左派群众、支援农业生产、支援工业生产、实行军事管制、训练院校师生的简称。在1967年3月至1972年8月的5年多时间中，解放军先后派出280余万人，分赴全国各条战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时间之长、任务之巨，是解放军建军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三支两军”的实行，曾使军队深陷“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漩涡，严重地损害了军队自身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建设和军队的发展。但是不可否认，它对于稳定“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

—

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这时，全国各级地方党组织和政府机关，已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公安、司法、检察、法院等机关，已失去或基本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呈现停产或半停产局面；各地武斗成风，社会秩序混乱，交通严重堵塞；全国局势已难以控制。

1月21日，安徽省造反派组织在召开“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大会”前，“请求”军队保护现场，以防对立派冲击，声称：“如果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省军区于21日14时前给予答复。

安徽省军区向南京军区请示。南京军区党委感到事关重大，当即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转呈了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

同日，毛泽东即在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一日

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军委碰头会人员，要求军队“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能够公开支持（左派）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并规定：“（1）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2）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该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3）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该坚决回击；（4）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防空洞；（5）要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随后，《解放军报》于25日发表题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社论。

3月19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向全军各部队提出。此后，以1月23日发布“支左”决议为起点，解放军“三支两军”便逐步在全国各地展开。

## 二

毛泽东作出“三支两军”决策，目的在于确保“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实施，避免生产建设受到冲击和损失，并将“文化大革命”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在人民解放军“支左”之初，中央军委于2月23日向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各总部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号召全军指战员“发扬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积极协助驻地农村人民公社和各级领导干部，抓好生产”；“各省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把抓好春耕生产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协助当地领导机关和人民公社，开好春耕生产会议，具体安排春耕生产落实”；“各级人民武装部门，动员全体民兵成为春耕生产的骨干，发挥民兵组织的生产突击队作用”；“各地驻军不失时机，以劳力、技术力量支持农业生产，并对破坏生产的各种活动，协助当地专政机关予以打击”。

《指示》下达后，全军各部队迅速行动，采取定点挂钩支援、普遍支援、定期支援和临时性支援等形式，支援地方农业生产。

3月3日，毛泽东又在一份“军委收电”上作出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人民解放军）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在这之前，为了扭转国内的混乱局面，解放军已开始执行“军管”、“军训”任务。

在“支左”尚未开始时，中共中央就决定“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并要求对“一切重要的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的重要单位，都要立即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1月26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发布《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决定“民航总局、各大区管理局、省（区）局、航空站、指挥勤务保障体系、机场和飞行学校，一律由军队接管，接管工作由空军组织实施”。

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先后作出一系列相关指示、决定，“军管”范围不断扩大。至1967年2月，全国已实行军管的单位达6900多个，大多为公安、邮电、报社、电台、银行、仓库和监狱等部门。其中，仅被军管的仓库就有3100多个，约占军管单位的一半，被军管的银行有1400多家。在以上军管单位中，人民解放军共投入兵力达32个团。

以后，随着解放军对“文化大革命”的逐步参与和介入，有的军队内部也发生混乱或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因此军管中还出现了一部分军队“管制”另一部分军队的怪现象。

这年2月19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关于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和《关于两所中学军训试点工作总结报告》作出批示：要求“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20天”，“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

3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在《天津延安中学以数学班为基础实施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上的批示：要求解放军除分期、分批对各个学校实行“军训”外，还要“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班子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并令全国各地驻军参照执行。这样，军队除“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外，又增加了“军训”任务，这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1967年4月3日，为了加强和保证对解放军“三支两军”的组织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在中央军委设立三个办公室，即支左工作办公室、支工支农办公室、军管工作办公室（军训工作不设办公室，由总参总政分管）。同时决定，“支左工作办公室”由肖华负责，并直接与中央文革小组联系；“支工支农办公室”由杨成武、邱会作等组成；“军管工作办公室”由叶剑英领导，并吸收总参、总政及军委办公厅负责人参加（其中，科研系统的军管由军委副主席聂荣臻负责，国防工办系统的军管由粟裕负责）。同时规定了各办公室的工作职责，即：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并负责向中央、中央文革和军委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办理中央、中央文革、军委交办的事项。

随后，解放军大批人员便投入到“三支两军”中去，并在全军师以上机关设立了“三支两军”指挥部，正式列入军队编制。

### 三

为了响应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号召，从1967年1月下旬开始，各部队陆续派出大批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仅1967年2月至1969年4月九大召开，全军每月投入“三支两军”的人员均在90万人左右，最多时达每月95万多人。此外，为“支工”、“支农”，空军部队还派出飞机1976架次、海军出动舰船237艘。尽管随着九大的召开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全国混乱形势有所好转，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逐年减少，但至1972年正式取消“三支两军”前，全军进行“三支两军”的人员仍有27万人。

在“支工”过程中，解放军在1967至1968年中，每年派出10余万人，深入厂矿、

企业，宣传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和党的各项政策，要求广大职工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余时间“闹革命”，同时在人力、物力、车辆等方面，给予恢复生产的企业大力支持，抽调大批技术人员携带物资、车辆，直接参加许多重点工程建设，使许多厂矿企业逐步得以复工，使国家一些重点工程项目得到继续建设和发展。

另外，解放军还经常派出人员、机械，到车站、码头进行突击装卸和运输，解决物资压车、压船、压港问题；并出动大批车、船、飞机等，抢运内外贸易的紧急物资，不少战士甚至还顶替工人采煤、采矿等。经过“支工”，“文化大革命”之初遭到严重破坏的工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避免了工业生产建设遭受更大损失。

解放军在“支农”中投入的力量最多、贡献最大。仅1967年2月下旬至3月下旬的一个月时间中，“支农”部队即达73.9万余人。到第二季度时，每天“支农”的解放军人数，就达50万人以上；“支农”负责的县（市）达2072个、公社达2万多个。1968年一年，解放军共抽出116个团、119个营、2666个连、125个排、861个宣传队，进驻到1236个县（市）社队，进行定点“支农”。据不完全统计，仅该年第二季度，用于“支农”的汽车即达2万余辆、各种机械800余台，马车3000余辆，出动劳力3000多万，支援公社、农场达1.5万多个。当年半年时间内，人民解放军为“支农”还出动飞机718架次、舰船42艘。广大解放军指战员普遍深入田间、地头、队组，与农民同学习、同劳动、同开会。经过与农村干部、社员群众的共同努力，减少了农业生产的损失。

在“军管”过程中，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仅在1967年前5个月中，就占全国7752个单位实行了“军管”，并对2145个单位进行了警卫保护。这一段时间，全军抽调担任军管和警卫保护任务的干部战士达15万人；实行“军管”的有9个省、25个大城市、176个县。同时，对中央各部委，除向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系统派出军管会（组）外，预定实行军管的部委达37个；对占全国银行总数42%的计1219个银行，实行了“军管”（其中，对辽宁省110个银行、上海市41个银行，均全部实行“军管”）。另外，还对占全国广播电台总数24%的547个广播电台（站）和占全国报社总量53%的111家报社进行了“军管”；并对全国18个铁路局中的10个实行了“军管”；对1041个厂矿实行“军管”，另对153个重点厂矿，实行了军事保护。在最为混乱的一段时间内，解放军甚至还对总政治部等一些军事部门和军事院校等，也实行了“军事管制”。这在当时局势混乱的情况下，保护了国家的财产、维护了国家的稳定、保证了国家重点建设的正常运行及社会生活的运转。

当毛泽东下达了“军训”的指示后，全军各部队又普遍承担起地方学校师生的军政训练任务。据统计，从1967年1月20日至2月10日20天时间内，仅驻京部队即派出4000余名干部，对北大、清华等5所著名高等院校计2.26万余名师生，进行了短期培训。之后，全军派出执行“军训”任务的人员逐步增多，参训院校及人数也大幅度增加。仅1967年4月，全军每天平均派出执行“军训”任务的人员即达5.3万余人，接受军训的学校则达3091所。至1968年第二季度，全国接受“军训”的学校猛增至1.17万余所。从总体上看，这次“军训”，对于恢复各级学校的教学秩序、防止出现更大规模混乱现象的发生，发挥了积极作用。

#### 四

在“三支两军”中，“支左”始终是其核心内容。“支左”出发点就是支持“造反派”夺权，这势必造成军队“支一派、压一派”。两派群众，必有一“革”一“保”，但在当时情况下，各派群众均争相论证自己是“革命派”，指责对方是“保守派”、“保皇派”。这曾使军队一度感到左右为难，并导致军队内部也出现严重派性。

军队派性的出现，加剧、扩大了地方两派的矛盾和对立，助长、延长了某些地区“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也败坏了军队的风气，损害了军队的形象和团结统一，破坏了军队建设。

1967年6月27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正确对待群众》的社论，指出：“识别左派，要看大节”，即看他们“是不是坚决地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对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还是‘保’，这是大节”。此后，各地群众组织为证明自己最为“革命”，开始更大规模地冲击各级党政机关，揪斗、打击和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而且各派矛盾加剧、斗争不断升级。从8月份开始，上海、南京、郑州、长春、沈阳、重庆和长沙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许多地区甚至还出现了银行、仓库、车船及档案机要文件被抢，铁路交通被严重破坏等严重的违法事件，全国上下陷入一片混战和内乱中。

为了制止派性斗争，毛泽东在一方面强调“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同时，另一方面力图对全国混乱局面加以约束，并发出了“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消除派性”的指示。他强调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1967年9月，军队“支左”进入“支左不支派”阶段。

此后，解放军“支左”人员开始手持《毛主席语录》，到处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并设法将各派组织的头头们集中组织起来，举办“斗私批修学习班”，力促“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在此基础上，领导成立了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组织负责人代表、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代表和革命干部的代表”所组成的，所谓“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一时间，各级“革命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中，多数的“革命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其主要负责人是由军队“支左”领导成员和解放军将领担任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军队干部为主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自然会将由林彪倡导的、军队时兴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活学活用”等做法，生搬硬套到地方工作中去，因此助长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地方上的蔓延，并对各地的生产、科技和文化教育事业造成一定冲击。甚至有些“革命委员会”成员，不顾当地的实际情况，机械地搬用军队制度和工作方式，搞“瞎指挥”和“强迫命令”等，不仅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也给地方工农业生产和科技文教事业带来一定损害。

从1969年秋开始，“三支两军”进入巩固“革命委员会”和“斗、批、改”的新阶段。

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全国各派组织基本走向联合，武斗基本得到制止，全国局势趋向稳定。1970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基本扭转了下降局面。

但在这一阶段中，由于政策界限不清，加之派性未能从根本上消除，曾经出现一些对立两派“相互揪斗”的现象，增加了许多新的冤假错案。

“斗、批、改”运动，因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突然发生而中断。1972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支左”人员于8月开始，陆续撤回，“三支两军”遂告结束。

需要提及的是，在“九一三事件”后，为了消除“三支两军”中的消极后果，毛泽东开始着手调整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他直接抓军队工作，并把一批顽固坚持派性的人调了下去，同时为防止派性死灰复燃，亲自决策“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与此同时，逐步落实党的干部政



策，并为一些军地高级领导干部恢复了名誉，使党和军队的内部团结及优良传统，得到了初步恢复和发扬。但是，真正的、大量的“拨乱反正”工作，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的。

1981年3月，当人们对“三支两军”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时，邓小平明确指出：对于“三支两军”，“只讲一句话不好，光戴帽子不好，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部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比如派性，还有一些‘左’的东西，相当大的成分是从那里来的。”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消极后果。”

□ 党史纵览 2006年第1期

~~~~~

【法网恢恢】

老法官王文正回忆审判“四人帮”

• 王 岚 •

岁月无情。许多的人和事，不管意愿如何，都已成为过去，成为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变迁；但历史也可能像一面哈哈镜，稍不留神，就会给后人留下一个不真实的印痕。为了这份责任，笔者拜访了年已八旬、原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法官王文正，听他回忆二十年前被调到北京参加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的一些史实。下面就是我在长达三、四年的时间里，和王老多次接触，听他点滴回忆的真实历史记录。

◇ 从上海调到北京，我被分在王洪文案预审组

1980年7月初，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给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发来一份电报，指名让我速去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报到。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老红军曾汉周再次给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来电话，限我五天之内必须到北京报到。

匆匆交待完手头的工作后，1980年7月15日上午9时正，我在上海虹桥机场乘上开往北京的航班。到达北京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直奔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当我走进招待所时，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汉周已经等在那里。我连忙上去紧紧握住他的手，曾汉周劈头就说：“王文正同志，听说你不愿意来呀！”我赶忙解释：“曾院长，您千万别误会，不是我不愿意来，而是他们……”没等我说完，曾汉周就会意地点点头。

当天下午，曾汉周再次来到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开门见山就给我布置了工作。他对我说：“这次让你到北京来，是参与公安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预审工作，便于了解案情，为将来的公开审判作准备。你分在王洪文一案的预审组，办公地点在秦城监狱。”听了这番话，我顿时感到这次来京意义非同小可。

1980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要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并决定由彭真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审判“两案”的工作。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听取关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审判准备工作汇报讨论会时，对于审判方式，邓小平说：审判方式，特别法庭好。一案起诉，两庭审理，一案判决。一审也就是终审，不准上诉。开出审判人员的名单，将来再定一下。常委会同意小平的意见，决定成立特别法庭进行审判。

特别法庭是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决定成立的。

负责王洪文预审组的组长是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卫之民。午饭后，我就去他那里报到，他简单地向我介绍了王洪文的情况，告诉我：在“四人帮”中，现在看王洪文还算认罪比较好的，你要抓紧时间看材料，看前期预审的录像，多了解些情况，然后在具体研究时可以更好地从法官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意见。

◇ 初次踏进秦城监狱的大门

第二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的一辆轿车来到国务院第二招待所，车上下来一位年轻干部名叫杨富年，他把我接上了车。车子向着西北方向开去，十点半钟到了北京郊外的秦城监狱。我走下车，环顾了一下四周，这里位于燕山南麓，三面峻岭险峰，只有朝南是一马平川。我早就听说过这座监狱，而那次是平生第一次走近它。这是一座特殊的监狱，建于1958年，当时有四个监区，各种与此相配套的设施一应俱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这里曾关押过战犯、国民党特务。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眼看大批“牛鬼蛇神”无处关押，林彪、“四人帮”一伙就在那里大兴土木，加建了两个监区，这里一共关押了500多名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各行各业的“反动学术权威”。

监狱门口，只见两位武警身挎冲锋枪，威严地站在那里。进出秦城监狱是要有特别通行证的，我因为刚从上海来的，还没有证件。陪同我去的那位同志让我在车上等着，他向站岗的武警出示证件后便独自进去了。过了一会儿，他从里面出来了，将办理好的有关证件交给武警，我们的车就开了进去。

下车后我被安排在一座监房里。原来，“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后，本来被关在秦城监狱里受迫害的老干部大多被释放了，空出许多监房，参加预审的部分司法人员就被安排在这里，每人一间房。我环视了一下四周，只见房里有单独的抽水马桶，但窗户很高也很窄，窗外布满铁丝网，透光度不是很好。这个房间就是我的住宿地方了。自此，我在秦城监狱工作了3个月。

我们每天的吃饭是在监狱食堂里解决的，参加预审的人员八人一桌，自由组合，伙食每人每月45元。吃饭的时候，我经常看到监管人员提着饭盒，来来去去地为关押着的犯人送饭，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四人帮”。当时，他们的伙食是每人每月35元。

◇ 进入特别法庭当审判员

当时从全国各地抽调赴京参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的相关人员（包括军队干部，王文正注）共达400多人，这么多人肯定不能全部进入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我作为参加预审的法官，同所有参加预审的法官一样，盼着自己能坐在庄严的审判台上，代表正义，代表人民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进行审判。但当时对于组成特别法庭的人员名单是保密的，我同样不知道。后来，在任命的31名特别法庭审判员中，我也在其中，而且因按姓氏笔画排列的缘故，我排在了第一位，一下子成了“首席法官”。再加上四位正副庭长，我的证件编号为第五号。

一进入秦城监狱，我就听到了许多关于林彪、“四人帮”利用这座“特级监狱”残酷迫害我

党高级干部的罪行，到现在还让我感到愤怒的是林彪、“四人帮”对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和曾担任过毛泽东保健医生、1955年就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傅连（日章）的迫害。尽管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愤怒，但是我同参加预审的同志们都深深明白，作为一名法官，绝对不能感情用事，绝不能搞“无罪推定”，也不能搞“有罪推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预审工作大量的时间是看材料，看录像。为了进一步弄清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当时许多中央的绝秘材料和文件都被调了出来，这使我们参加预审的人员了解了许多当时高层斗争的内幕，了解了许多历史的来龙去脉。材料一律只能在规定的屋子里看，不准任何不相干的人进出屋子，离开时都要交给保管人员锁上，保密工作做得很严。

记得有一天，我和参加预审的部分法官正在看录像，只见一辆轿车从第二道大门外开了进来。车停下后，从车上走下一位女同志，径直朝我们看录像的屋子走来，进屋后，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和我们一起看。当看完后大家才发现，原来这位静静坐在一边的女同志竟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只见她站起来环顾了一下这间昔日的囚室，感慨地说：“一场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而我却在这里被关了12年，比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还长啊！”

预审工作是复杂而尖锐的。为了不打无准备之战，在特别法庭开庭前，特别法庭的法官们对开庭审判“四人帮”进行了预演。一天晚上7时，我和特别法庭的审判员们准时走上审判台，台下则坐满了参加旁听的公、检、法机关的人员，这些人很多都是原来参加过对江青反革命集团预审工作的，对情况比较熟悉，便于在开庭前提出可以避免的一些问题，使审判达到预期的效果。“江青”被押上来了，这是一位40岁左右的女同志，外形、气质很像江青，由于她曾参加过对“四人帮”的预审，了解情况，又口齿伶俐，在反辩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问题都特别令人难以答复，在这次模拟法庭上，双方一直辩论到晚上10点钟。通过这次预审，特别法庭的法官们更进一步认识到这场审判的重要和艰难，这种审判，是我们从事法官生涯以来从没有碰到过的。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的审理，从1980年11月20日开庭到1981年1月27日，历时二个月零七天。为了查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先后33次开庭，对十名被告人先后进行了45人次法庭调查，对873件各种证据进行了认真反复的审查。在庭审中，特别法庭先后向被告人出示和宣读了档案、信件、日记、笔记、讲话记录和录音等经过鉴定、验证的原始书证和物证共651件次，通知被害人和证人到庭陈述和提供证言共49人，做到凡是认定的犯罪事实，都有充分确凿的证据，从而查清了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特别法庭调查结束后，还进行了许多次法庭辩论。在辩论时，特别法庭依法保护了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和辩论终结后的最后陈述权。特别法庭既不会因为被告人过去的地位高，而在犯罪后使他们可以不受法律制裁，也不因为被告人是人民痛恨的人而剥夺他们在法庭上依法享有的辩护和陈述的权利。江青和黄永胜在法庭上分别作了近两个小时和三个小时的辩护和陈述，这充分表明了 we 坚决执行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原则。

◇ 我是第一审判庭的主审之一，审判了王洪文、张春桥

王洪文被第一个押上了被告席。

法庭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了长达两万多字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提起公诉。

起诉书宣读完毕，江华庭长宣布：对本案十名被告人，将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审理。由第一审判庭审理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由第二审判庭审理的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我当时是第一审判庭的审判员。

1980年12月13日上午9时，第一审判庭开庭，江华庭长出席，审判长曾汉周主持庭审活动，审判员王战平、我和曹理周进行主审。法庭就被告张春桥、王洪文被指控的1976年策动上海武装叛乱问题进行庭审调查。在法庭上，王洪文的认罪态度还是比较好的。对起诉书上指控的，他供认不讳，都说“是事实”。

审判江青时很富戏剧性，也让江青的表演天才又发挥了一次。11月20日下午3点15分，随着江华庭长高声喊道“传被告人江青到庭”的余音，江青由两名女法警押着从候审室走进了法庭，这时整个审判庭一片寂静，近千双眼睛齐刷刷地盯住了她——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红都女皇”。此时的江青已经66岁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她用手捋了捋头发，那是一头整齐乌黑的头发，紧闭着的嘴角挂着一丝冷笑，态度颇为傲慢。她一边听着黄火青检察长宣读起诉书，一边东张西望，还不时用眼睛斜视着几个同庭的被告。

近几年来，有的报刊上说“江青是叛徒”，当年特别法庭在庭审调查时，没有审问江青的叛徒问题，因为能够证明她是叛徒的证据不足。江青1933年从青岛来到上海后就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后来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介绍江青加入了共青团，一直到她1937年去延安。

“文革”期间，江青曾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说自己是1931年“9·18”事变时期入党的。事实上，江青是1933年在青岛由黄敬（即俞启威，江青的第二任丈夫）介绍入党的，而黄敬是1932年在青岛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那时中共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的联系，都是通过黄敬接头的。江青在入党后仅几个月，因为黄敬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就私自跑到上海来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即1954年，杭州发生了一起对江青有关历史情况的匿名信事件，信中揭露了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种种丑恶历史问题，要她主动向党中央做出交代。那时江青正在杭州，当时的国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遵照上级指示，由一局局长凌云等专门组织了力量对此进行侦察。因为匿名信是从上海发出的，加上江青的历史不少与上海有关，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公安部的部署，也组织人员参与调查。他们在调查过程中，查阅了大量30年代出版的报刊杂志，接触了解到江青在上海的一些历史问题。

一开始，江青对此事并不了解详情，“文革”开始后，张春桥利用窃取上海党政大权的便利，从上海市公安局调出在调查对江青历史情况的匿名信事件中所形成的档案材料，别有用心地送到江青手里。江青看后，深恐自己在30年代的丑行被曝光，就暗下毒手，和叶群、吴法宪、谢富治勾结一起，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大冤案。他们把江、浙、沪、鲁等地的公安厅局长逮捕起来，以上海市公安局为例，凡是参与侦察此案，接触过江青上世纪30年代历史问题材料的6名局级以上干部、9名处级干部（其中警卫处长王济普、档案处女处长王学纯被迫害致死）、6名科级干部、5名工作人员共26人统统抓了起来，押送北京长期关押，进行迫害。

在法庭上，曾遭江青迫害的文艺界知名人士郑君里的夫人黄晨出庭作证明，她对坐在被告席上的江青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认识我吗？你是篮苹，我是黄晨。我告诉你，你在30年代的历史，我是清楚的。”

这时，江青就转过头朝着黄晨叫了一声：“阿黄！”

听着黄晨声俱泪下的控诉，江青狡辩说：“阿黄，这我完全不知道。”

黄晨当即斥责道：“你篮苹，你把我们搞得家破人亡，你这个人，多么毒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在庄严的法庭上，江青极尽抵赖之能事，对公诉人提出的有关指使他人去抄郑君里等人家和抄查来的材料是不是知道及烧毁时是否在场等等，江青一开始都说“不知道”，后来又改口说“看了材料才知道”。随着证人的出庭作证和大量证据在投影仪上的显示，江青竟然天南地北地扯到她在抗战时期到重庆治牙以及她如何认识赵丹等人之事，避不回答实质性问题，避重就轻说“有信件来往是正常的”，“不值得抄家”等。但时至今日，谁也弄不明白江青当年何以要为一些朋友间“正常来往的信件”大动干戈，以至于置人于死地。身为共和国第一夫人，江青到底害怕什么呢？

张春桥在法庭上的态度，正好和江青完全相反，是另一副表现形式，那就是沉默，一言不发。无论审判员问他什么，他都微闭着双眼一声不吭。难道他没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吗？还是他自知罪孽深重，说什么也无法弥补自己犯下的滔天大罪？或者，他要以这样一种姿态，来完成最后的人生表演？

张春桥的表现说明他不聪明，和法律较什么劲呢？何况犯下的又是滔天大罪，难道缄默不言就能逃避法律的惩罚？

1980年12月4日，第一审判庭开庭审问张春桥。当穿着中式夹袄、敞开着领口的张春桥被押上被告人席后，就似老僧入禅。

审判员问：“张春桥，1974年10月17日夜，你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钓鱼台17楼，一起策划，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主席诬告周恩来、邓小平，你当时讲‘邓小平跳出来’，‘不是偶然的’，是不是事实？”

“张春桥，你从1967年、68年直到1975年，多次讲过‘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是不是事实？”

“被告人张春桥，1966年12月28日，你从北京给你在上海的妻子李文静打电话，要她告诉造反派‘胜利果实不能被赤卫队夺去’，‘不能置之不理’，制造了上海康平路事件，是不是事实？”

“你指挥的‘游雪涛小组’，专门进行收集情报和跟踪盯梢、绑架、抄家、监禁、秘密刑讯等迫害干部、群众的特务活动，是不是事实？”

.....

面对审判员的提问，张春桥一概不答。审判员不得不再次对他说明：本法庭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曾多次向你宣布，你在庭审中有辩护的权利。你可以作出有罪的陈述，也可以作出无罪的辩解。今天是法庭调查，你对起诉书中指控你的犯罪事实，如果你认为属实的，要如实地供认；如果你认为事实有出入的，可以提出否认的根据，我们是坚决依法办事的。但张

春桥还是不开口。

随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都作了书面证词。

作为“四人帮”首恶之一的姚文元，公审结果只被判 20 年有期徒刑，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

姚文元在法庭上很会辩论，不像张春桥不说话和王洪文比较认罪。当法庭在最后一次调查时，他看来是有所准备的，在退庭之前，主动提出“还有一个问题没有问”，审判长曾汉周知道他提策动上海武装叛乱问题，当即回答他：“你愿意写就回去写吧。”

时至今日，有许多人认为姚文元的罪行是被律师辩护掉的，连王秀珍后来也指名要为姚文元辩护的律师为她做辩护。事实上，这只能说明我们党对“四人帮”的审判是一切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因为姚文元不是上海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策动者，所以最后被判 20 年有期徒刑。

□ 党史文苑 2006 年第 1 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